

中国方志学

著者：王德恒
许明辉
贾辉铭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方志学

著者 王德恒

许明辉

贾辉铭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 国 方 志 学
王德恒 许明辉 贾辉铭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北京前海西街17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7印张 500000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8.00元

ISBN7—5309—1316—9/K·57

前 言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优良文化传统，而且自秦汉以来一直没有间断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组织之下，中华大地再一次兴起建国后全国普修地方志书热潮，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回顾10余年的风风雨雨，汇集各地的修志经验和教训，总结各家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项极有意义和价值工作。许明辉、贾辉铭二君长期工作在河北省修志工作的第一线，不仅身膺要职，而且极富修志实践经验，研究成果更是可观。我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工作多年，教学、研究之余，又有机会涉猎各地的志书，这正是我们愿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上，通力合作编写《中国方志学》的出发点。

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三部分。一是地方志和方志编纂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是旧志整理和资料工作；一是新志编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叙述方志的发展历史，首先遇到的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考察各个朝代的志书，我们发现方志体裁和内容形式的发展变化并不总是同各封建王朝的更迭保持同步，往往显现出一种“滞后”的历史现象。因此，我们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历史分期划分的形式来分述方志和方志编纂理论的发展历史，以求更清楚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

旧志整理和资料工作，在志书编修过程当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关乎志书的质量。特别是有关整理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方法和手段，以往的一些论著多嫌简略，所以我们稍加笔墨，分设专章加以介绍，以求实用。

有关新志编修的基本理论，在撰写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尽

可能地吸收和反映当代修志工作的经验，本着求“是”的精神，以切实用为宗旨，按组成志书的不同体裁形式分别加以论述。其中志书的篇目设计、语言文字、志书的审评与总纂及出版问题，经过10余年的实践，各地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也分设专章加以介绍。

我们虽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意吸收各地新志编修经验和研究成果，更想系统地阐述方志科学的基本理论，但限于水平，恐难遂所愿，或有疏漏，所以竭诚希望方志同仁不吝赐教，予以匡正。

在初稿完成之后，我的老师来新夏教授于百忙之中，曾通阅全稿，并指出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王德恒

1993年11月于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1)
第二节 方志的基本特征.....	(8)
第三节 方志定义.....	(13)
第四节 中国地方志存佚及收藏情况.....	(21)
第五节 方志学.....	(26)
第二章 中国地方志发展概况	(35)
第一节 萌芽时期.....	(35)
第二节 地记盛行时期.....	(44)
第三节 图经盛行时期.....	(49)
第四节 方志定型时期.....	(58)
第五节 方志编修兴盛时期.....	(71)
第六节 方志编修全盛时期.....	(83)
第七节 方志编修变新时期.....	(94)
第八节 方志编修创新时期.....	(105)
第三章 地方志编纂理论发展概况	(116)
第一节 隋唐以前.....	(116)
第二节 隋唐两宋时期.....	(119)
第三节 元明时期.....	(125)
第四节 清代.....	(134)
第五节 民国时期.....	(149)
第六节 建国后的新方志理论研究工作.....	(158)
第四章 旧志整理	(168)

第一节	建国前旧志整理工作概述·····	(168)
第二节	建国后的旧志整理和研究工作·····	(175)
第三节	旧志的价值与局限·····	(187)
第四节	编辑方志目录、索引、类编资料方法简述 ·····	(195)
第五章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205)
第一节	文献资料的分类·····	(205)
第二节	文献资料的收集·····	(213)
第三节	文献整理工作总论·····	(223)
第四节	鉴别真伪·····	(227)
第五节	考订内容·····	(238)
第六节	校勘文字·····	(250)
第六章	新志编纂的指导原则·····	(264)
第一节	新志编纂的指导思想·····	(264)
第二节	新志编写原则·····	(275)
第七章	志书的体例与篇目·····	(281)
第一节	志书的体例·····	(281)
第二节	篇目的作用与编制原则·····	(288)
第三节	篇目的编排形式·····	(302)
第四节	篇目设计的一些技术问题·····	(305)
第八章	概述编的撰写·····	(317)
第一节	概述编在志书中的应用·····	(317)
第二节	概述编的体裁特点·····	(320)
第三节	概述编的作用·····	(322)
第四节	概述编的类型·····	(324)
第五节	概述编的内容·····	(327)
第六节	概述编写法举例·····	(331)
第九章	大事记的撰写·····	(338)

第一节	志书记体的发展演变·····	(338)
第二节	大事记的体裁特点及作用·····	(341)
第三节	大事记的类型·····	(345)
第四节	大事的收录标准·····	(348)
第五节	大事记编写的若干问题·····	(352)
第十章	分志的纂写·····	(358)
第一节	志体的发展与演变·····	(358)
第二节	志体的体裁特点及作用·····	(361)
第三节	分志的体例类型·····	(363)
第四节	分志的内容·····	(366)
第五节	分志编写的若干问题·····	(370)
第十一章	人物志的纂写·····	(377)
第一节	志书传体的发展与演变·····	(377)
第二节	传体的体裁特点及作用·····	(379)
第三节	人物立传标准与范围·····	(383)
第四节	人物志的构成·····	(388)
第五节	人物志编写的若干问题·····	(392)
第十二章	志书图表的绘制·····	(399)
第一节	志图的发展与演变·····	(399)
第二节	志图的体裁特点及类型·····	(401)
第三节	志图的配制问题·····	(404)
第四节	志表的发展与演变·····	(407)
第五节	志表的体裁特点及类型·····	(409)
第六节	志表的编制问题·····	(412)
第十三章	志书的语言文字·····	(417)
第一节	文风·····	(417)
第二节	文体·····	(425)
第三节	文辞·····	(432)

第四节 志书行文规范·····	(440)
第十四章 新志的总纂与评审出版 ·····	(447)
第一节 新志的总纂·····	(447)
第二节 志书的评议·····	(455)
第三节 志书的审定与出版·····	(462)
附录一 文献辑存 ·····	(470)
1. 纂修志书凡例(明永乐十六年颁降)·····	(470)
2. 修志事例概要(中华民国十八年内政部呈奉行政院转奉国民政府令准通行)·····	(472)
3. 中国地方志小组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	(474)
4. 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家档案局《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	(475)
5.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章程·····	(478)
6. 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1982—1990)(草案)·····	(480)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恢复地方志小组工作的请示报告》·····	(483)
8. 中共中央宣传部 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 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485)
9. 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 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的通知·····	(487)
10.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490)
11. 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	(495)
12. 中国地方志全国规划会议纪要(1985年5月)·····	(497)
13. 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同志讲话 (1986年)·····	(500)

- 14. 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七五”规划及长远设想
..... (506)
- 15. “七五”期间旧志整理工作规划..... (509)
- 16. 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1988) (511)
- 17. 1991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1991) (518)
-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问题的
批复..... (526)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

方志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经过历代人们的不断地充实、完善、提高而逐渐演进为现今形式的地方志书，其源何在？这不仅是方志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有关方志的起源问题，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方志源于古史书说

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的观点，由来很久。早在宋代，一些学者和修志实践家即明确地提出此说。如宋代郑兴裔在他的《广陵志·序》中即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并且还言：“圣天子采风问俗，借以当太史之陈，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矣”。^①到了明代，视史、志一体的看法已成为常谈。如明代《万历河东运司志》蒋春芳序称：“夫志，史乘之流也”。《嘉靖孝义县志》张冕称：“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今郡县有志皆史也”。张嘉谟序《万历隰州志》称：“夫郡有乘，犹国有史，体裁虽异，而编摩考据，彰往诏来，则未始有异也”。都不出史志同义的原则。

发展至清代，由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着力强调，认为史志同源，一时成为主流，一直较其它诸说流行，影响至今。如近人梁启超即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②李泰棻也说：

^①（宋）郑兴裔：《郑忠肃公奏议遗集下》

^②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第298页 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中华书局本1985年影印本

“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即某省史，而某县志亦即某县史。”^①直接地将地方史与地方志视为同体。即使今日，一些人们习惯上将地方志同地方史等同起来，不分界全。

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者，或推自《周官》；或起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源于《华阳国志》，虽上溯的年代有异，所指的源头不同，但认为方志源于古史书的见解却是相同的。如清代章学诚即认为方志源于《周官》，称：“方志之由来久矣，……余考之《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梣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②“郡县志乘即封建列国史官之遗”。^③章氏认为方志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演变而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不同于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修的“国史”，不具有代表封建王朝统治的那种权威性，其最大的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因此，也可称为方域之史、或地方之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的撰写曾盛极一时，如墨子曾言：“吾见百国春秋”。^④遗憾的是这些书籍未能流传下来，以现存的《春秋》经传考之，其无论是在体裁或内容上，同后世的方志大不相同。即以现存的往往被推为方志源头之一的《华阳国志》而言，也多偏于地理，同后世方志尚有较大的距离。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同后世方志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更为明显了。

史学对历代方志编纂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史学各种书籍的

①李泰纂：《方志学》第1页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②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见《章氏遗书》卷14

③章学诚：《为张吉甫司马书大名县志序》见《章氏遗书》卷14

④见《孟子》一书

体裁、形式的产生与发展，为方志的修纂提供了借鉴的体例和丰富的营养，于今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若简单地据此将史、志完全等同为一体，而无视其它学科对方志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对方志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指导方志编纂实践以及志书对各种书籍体裁和形式的借鉴与利用，都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二、方志源于古地理书说

从古至今，有关一方地理情况的记载，一直是方志的一项主要内容。历代一些公私藏家目录也多将方志划归地理类，所以持方志源于古地理书者颇有市场。持此说者往往将方志的起源上溯至《山海经》、《禹贡》等古地理书。

《山海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地理书，全书18篇，计分《山经》5篇、《海经》13篇，约3万余言。据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山经》主要部分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也最为丰富，是全书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而其它部分则是后人增补的，现存形式的《山海经》可能是在汉代形成的。

《山经》共论及400余座山，按方位分为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为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远及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进行了综合记述。记其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等。此外，还附载有民情、巫医、祭祀、神祇、怪异等内容和百余位历史人物及他们世系和活动，内容广泛，同后世方志设风俗、载人物、记地理多有相通。因此，不少志家往往多叙及《山海经》与后世方志之间的渊源关系，如《隋书·经籍志》称（南齐）陆澄《地理书》、（梁）任昉《地记》说：“陆澄聚（《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宋代欧阳忞在《舆地广记》序文中也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

中”。可见《山海经》与古方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山海经》叙事之时，多“怪诞不经”，存在不少失实和错误之处，所以它的地理价值并未引起人们的过多重视。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山海经》“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竟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无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未允”。而将该书列入小说家言之类。后经清代学者毕沅与邵懿行等人的考证与注释，《山海经》一书才渐为世人所重。《山海经》虽多怪诞之说，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毕竟是次要的一面，而它所保存的丰富资料，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的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禹贡》是古代典籍《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述年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其成书稍晚于《山经》，大约也是在战国时期。《禹贡》极为简约，不过1200余言，但作为一部古地理书而言，其科学价值远在《山海经》之上。《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豫、荆、梁、雍九州，分别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风情等情况，作了简要的记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区域地理志。

《禹贡》素为后世一些志家所重，并被视为方志的源泉之一。特别是继《禹贡》之后所撰的全国性区域志，很多在体例或内容方面与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连系。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禹贡》的影响。特别是元代朱思本撰的《九域志》则完全以古九州为准而统领诸省、府、州、县。如朱思本自序言：“矧历代以还，自嬴秦破九州为郡县，中古以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仅仅徒有其名，几于漫遗湮没。暇日因取群籍，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

省，以都省分隶九州焉”。

《禹贡》在方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地理志；其二，它是最早按行政区划记载内容的全国性区域地理志，尽管这种区划仅是一种假托，是一幅蓝图，反映的是当时人们渴望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统一的一种要求，而非当时历史的真貌，但是《禹贡》按区划记载内容的编排形式，却对后世方志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方志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后世方志与古地理书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并且早期的一些方志更是与地理书密不可分，很难完全区划得清楚。难区分并不等于说两者同体，方志与地理书在内容侧重、体例形式方面始终是有所不同，并行发展的。现今形式的方志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已非地理学所能包纳。因此，现今仍认为方志与地理书同源、同体，也就难免欠妥。

三、方志源于古地图说

一些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最初语言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图而不是文字。在中国众多的古籍当中，就有不少关于远古时代图的记载。如《尚书中候·握河记》中就有“龙马负图”的记载，传说伏羲氏时，有形似马的龙背负着河图在黄河上出现。但这种传说中的河图可能不含地图的意味，而是作为一种吉凶符验的图谶。真正关系到远古时代地图的记载大概要算《世本·作篇》所记的“史皇作图。”相传黄帝同蚩尤作战时，曾使用了部下史皇所绘的地形物象之图。《左传》中也有关于禹铸九鼎，鼎上绘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禽兽图象的记载。这些传说虽不见得都是确凿的史实，但是早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中国即绘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原始地图的说法，却为大多数学者所能接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使用就颇为广泛了。如《周礼》中言及地图即达十余处之多，并记有专门的职官。有掌闾里版图的“小宰”；掌百物财用地图的“司书”；“掌建邦之土地之图”的“司徒”；“掌九州之图”的“司险”；“掌天下之图”的“职方”；“掌金玉锡石”等矿产分布图的“矿人”；“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冢人”；专门为天子“掌道地图，以诏地事”的“土训”等。《周礼》大约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它虽“托古”于周公之世，谅必有相当的历史根据，而不是全出于虚构。此外，战国时期成书的另一部著作《管子》还设有《地图》篇，专门对当时军事地图的内容及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根据《周礼》、《管子》两书的记载可知，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图的绘制即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且种类很多。

由于地图的广泛应用，人们为了更好地说明和利用地图，于是便在地图之外又加了文字说明，从而导致了“图经”的兴盛。作为早期志书的一种形式——图经，历隋、唐、北宋时期，一直兴盛了500余年之久，对后世方志的发展与定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一些方志学家往往把方志之源上溯于古地图。如明代《嘉靖太平县志·图序》称：“《周礼》九州之图掌于职方氏，此后世图经之所由作也。志以记事而先之图，义亦如此”。近人王庸更称：“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①

指出后世方志与图经、古地图的传承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地图学发展的各历史时期，虽然对志书的编纂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作为地图学科本身而言，却有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因此，还不能简单

^①王庸：《山海经图与职方图》 见《禹贡》半月刊1卷3期。

地认为方志源于古地图，也更非地图学科所能容纳。

四、方志多源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古地理书”、“古地图”与后世方志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关系，也曾对后世方志的发展与定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针对这种客观实际，一些志家注意到方志渊源的多源性特点，提出方志多源说的认识。如《隋书·经籍志》中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权德舆称：“唐贾耽据夏书《禹贡》、《周官·职方》、《汉书·地理》”作《贞元十道录》。^①宋代欧阳忞撰《舆地广记》也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②元代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记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四库全书总目》则总结言：“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各家所言虽侧重不尽相同，但是大都注意到方志多源这一特征。到了今日，特别是在80年代的修志实践当中，一些论文和著作对此问题都作了重点论述。他们认为中国方志经过长达2000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而最终成为如今这种包罗诸类，无所不载的特殊体裁形式的著述，不可能仅从一种著作形式演变而来，它必然从多方面汲取源泉和营养来补充和完善自己，融汇了诸体之长。

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处于萌芽时期的志书同古史书、古地理书、古地图之间，并不是区分得很清楚，也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志从萌生之期起，就从其它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按照

^② 欧阳忞《舆地广记序》

^① 权德舆：《魏国公贞元十道录序》 见《权载之文集》卷35